

平等的双向性关系通过相互影响进行吸收的，而是日本研究者单方面接受来自美国学术界的各种理论观点，不能不说基本上是单向性的。在这里将学术性学科理论的水平分成了金字塔形的多个层次(hierarchy)，把美国的学术界置于顶点，其次是日本和西欧各国，再下面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

今天，很多的中国学专业的日本学生和研究者，在相当程度上熟练地掌握了中文日常会话，这也反映了以经济贸易为中心的中日交流实务层次上的盛况。但是如果涉及到学术层次的对话和讨论所必须的高水平的中文，能力还是极端匮乏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受邀来日的中国学者如果缺乏日语和英语能力，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就不太可能接受的理由就在于此。很明显，认为中国的学术界没有“值得学习”和“值得称之为理论”的地方，造成了对学术性对话必要的学术层次的中文练习的轻视，这也受到了日本学术界根深蒂固的对华评价的影响。

结果是，作为“地区研究”一部分的现代中国研究，在积极从事在中国的社会调查(fieldwork)、访谈及搜集信息资料和研究素材等工作的同时，却抱有并不在学术交流上充分留意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倾向。⁵⁷这一点也正是现代中国研究中轻视采用“验证程序”、很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中国社会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果纵观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历史，可能会对是否都具有上述倾向这一点产生疑问。因为一部分意见认为文革时期日本的中国礼赞式研究倒是发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⁵⁸

但是礼赞性研究如果真的认为可以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到“值得学习”的地方，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大学处于封闭状态的时期之外，理应出现日本的青年学生踊跃前往中国大学进行“学术留学”的现象。可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尽管日本的日中友好访华团频繁访华，但教育和学术交流却几乎没有。总体上可以说包括文革期在内，战后直至今日，前往中国进行“学术留学”的日本学生人

数极少，几乎都只止步于“语言留学”的阶段。与此相对照，战后日本赴美留学是什么情况呢？加上福布赖特奖学金的关系，赴美“学术留学”的情况一直占绝对优势，大多数留学生都将取得学位作为留学的目的。

这说明，即使在文革当时的中国礼赞性研究中，也没有在学术层次上把中国看得很高。就算是当时存在着中国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的评价，但也只是在与学术领域不同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实践运动层次上看到了中国的价值而已。

比如说文革期间，因中国礼赞派出名的菅沼正久和山内一男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就出于理论斗争的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商品价值关系”和“劳动价值学说”问题上与对中国持批判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岗稔和副岛种典等进行了相当精密的争论。但是很明显，在这场论争中，来自中国国内的观点并没有被当作学科理论，而只被作为论争的材料，完全没有期待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相互对等的理论探讨的迹象。⁵⁹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水平上中国不如日本的成见影响很大。

(10) 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问题

从这种现状就不难想象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导致了什么样的问题。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第一个方面就是，日本研究者对中国现状的诊断(因果论分析)，原则上并不是以对中国现状进行直接“治疗”为目的的。依据这种诊断而下的药方，除了有一小部分作为建议的形式被中国决策当局所采纳外，大部分只是以成为日本社会各界的对华政策、对华交流的治疗方法(制定新政策和修正旧政策)为目的的。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中国研究者在方法论上并没有自觉意识到上述现实目的与自己的研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对于现代中国研究的目的，以及对与其成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日本社会各界应该采用的“信息公开”、“责任说明”

和“对话”等“验证程序”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也没有自觉认识到其必要性。

可以认为，这种方法论上自觉意识缺乏的产生背景，首先在于与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目的及成果有利害关系的日本社会各界既不具备通过与研究者的“对话”、依照“信息公开”和“责任说明”对该研究进行“验证”的能力，也没有希望利用这种“验证程序”的充分要求。⁶⁰对于日本社会各界来说，即使现代中国研究与自己有利害关系，但是其研究内容却并不是他们所熟知的日本社会。况且日本社会各界的对华认识只是限于其自身从事的中日交流的个别、局部的认识，缺乏宏观的认识。因此他们所要求的现代中国研究并不能成为宏观与微观观点相结合的专业分析。

但是日本社会各界无论在对这些专业研究是否可行进行“验证”的要求上，还是在进行实际“验证”的能力上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即使有来自日本社会各界对日本研究者的中国研究的反应（批判或赞同），其内容也只能是随意性很高的从个别或局部观点出发所得到的主观性结论，并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过“验证程序”的内容。

问题的第三个方面是，就算是研究者丝毫没有试直接“治疗”中国现状的主观意图，但是现实中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仅影响了日中关系，同时也间接引起了中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并进而影响了中国的内政。而对这一点并没有在方法论上进行自觉认识。因此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当然就不会表现出采用“信息公开”、“责任说明”和“对话”等“验证程序”的姿态了。

如果我们再次和研究的目的论相联系进行确证的话，就会发现现代中国研究的对象——为研究提供必要的第一手资料信息的作为外国社会的中国社会，有可能因日本人的中国研究的成果而使自己的利益间接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却很大。具体来讲，日本的中国研究可以左右日本社会各界的对华认识，并进而左右中日关系，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的外交内政。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却没有处在可以直接利用日本的中国研究成果的地位。

就是说，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在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基本上不会形成目的论（研究目的），另外基本上无法根据直接的反应（表明赞同或批判的态度）对研究内容（具体而言就是研究目的，用于研究的信息资料，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成果的发表和利用方式）的可行性进行验证。简而言之，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成果的利害关系者（中国社会）却被置于没有充分发言权的地位。

尽管面对这样的事实，作为近现代科学的现代中国研究本来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带有对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重构（治疗方法）的意图。大部分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批判性地论及中国现状正是出于这种意图。

笔者就此认为现代中国研究者在方法论上存在以下欠缺。

第一，日本研究者缺乏可以有意图地改变研究对象中国之现状的主体性条件。尽管如此，出于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构的近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本性，其因果论分析就会如同自身已经具备了适当的主体性条件，以模拟主体的形式展开仿佛可以重构中国的“言说”（discours）。

第二，大多数日本研究者不可能自觉意识到自己对研究对象（客体）的这种“主体模拟性”。特别是不承认自己的研究会不可避免地带有目的性价值判断，认为超越价值判断才是确保研究“客观性”的最佳选择的研究者，就更不可能自觉认识到其主体的这种“模拟性”。

第三，作为没有自觉认识到主体“模拟性”的后果的反映，研究者对于自身研究“真正的”主体条件就在于可以改变日本社会各界的对华政策、对华交流状况这一点上，也没有形成在方法论上的自觉认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就不可能自觉认识到通过“真正的”主体性条件是可以间接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的。

第四，由于在方法论上没有自觉认识自身的主体性条件，当然也就不可能对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所开展的因果分析会对世界产生何种利害关系产生自觉。就是说在方法论上并没有自觉认识到自己的

研究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目的性价值判断，也就不可能充分自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研究者结果甚至也就不知道该对什么样的研究对象采用“信息公开”“责任说明”“对话”等“验证程序”。

[IV]

结语

在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一种相互联动的“共同主观性”在中日两国之间施加着影响。在这种“共同主观性”中，存在着以“东方主义”为代表的认识偏见，也即将欧美世界放在“主体”位置，而将亚洲世界（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视为“客体”，并给予“主体”以优越性。而率先洞察到这一点的就是竹内好。

如同前面提出的沟口雄三对竹内好的批评那样，竹内好将中国视为可以照见日本的“镜子”，或者说在日本这面“镜子”中观察中国，采取了将彼此作为映照对方的“镜子”的方法来观察中日两国。作为认识中日两国间“共同主观性”的偏见并欲加以克服的方法，竹内好将研究的主客体定位在像镜子一样的“等价”关系的确有一定效果。但是仅仅这样，并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中日两国之间以及亚洲与欧美之间长期存在的“共同主观性”的偏见即“东方主义”。

1989年3月，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

结》⁶¹中明确提出，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推动了欧美现代化的自由主义将凌驾于其他所有的政治理念之上，自由主义作为黑格尔定义的“绝对精神”已经步入了“自我实现”的最后历史进程，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处于支配地位。福山乐观地推测，这个最后的历史过程将向“成熟的无政府状态”（B·布赞）或者“安定体制”发展。但是1992年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⁶²则悲观地论述了自由主义文明与非自由主义文明之间的冲突，预测世界将可能走向“不成熟的无政府状态”。⁶³

尽管悲观论、乐观论各有不同，但是福山和亨廷顿都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作为“欧美现代化”的理念，自由主义已经进入了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展”的阶段。这种推断直到今天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美国布什政权以“自由主义”国家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为由，明确表示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自由主义才是美国和世界安全的基础，而在实际行动中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将“东方”和“西方”之间产生的共同主观性偏见称为东方主义并加以批判，是萨依德和科文的重要贡献。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却只能说这种偏见正在扩大。

下一部分将以“竹内好再考”为中心，探讨从何处入手，可以发现在这一点上进行方法论范式的转化。

1 毛里和子在其《现代中国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3年）〈序章〉中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总是出乎观察者的意料”，并就此议论为何会在对现实的认识和对未来的预测上产生谬误。同样，天儿慧在其《中国：变化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也明确提出：“我国的中国研究为什么总是一贯地被当时的中国‘现实’所翻弄呢？”，并以此开始讨论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2 例如船桥洋一的《内部》，朝日新闻出版社。

3 丸山真男：《增补版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64年。

4 吉本隆明对丸山政治学进行批判，认为其只不过是“大众”作为一个虚拟的形象。

5 这里引用的“世界观”是指对世界进行认识时，规定此认识的价值判断体系或意识形态体系。

6 列维·斯特劳著、室淳介译：《伤感的南回归线》（上、下册），讲谈社，1985年。

7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nd Enlarged Edition, 1970. 托马斯·度恩著、中山茂译：《科学革命的构造》，美铃书房，1971年。